

試析春秋戰國貴玉賤珉的玉文化*

黃建淳**

提要

春秋戰國僭禮越制的動盪時代，諸子叢起，百家爭鳴。儒家學派繼承古人崇玉愛玉的傳統，以玉的特質屬性，注入了崇高的玉德學說，主張「君子比德於玉」，提倡「道之以德，齊之於禮」的政治理想。從而使貴族階層咸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手段，既可表彰為「以玉比德」的君子，又可炫耀成「以玉比富」的高貴，在中國玉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深遠。

本文依據古籍文獻的記載，並結合考古資料與公私立若干收藏，探討斯時儒派玉德之與玉器文化的相關影響。

關鍵詞：春秋戰國 貴玉賤珉 玉德 以玉比富 玉文化

一、前言

西周王朝歷經十一代、十二王。自武王克翦殷商，立國建都、天下攝服。成王、康王仰周公德政，文治武功、朝綱安定。昭王、穆王南征西討，擴展政權、國力充實，其三百年來之力征經營，面向多對東南而不對西北。終至幽王、平王之世，犬戎、申侯來犯，幽王見殺於驪山下，周室分裂，迫平王東遷洛邑，自此跨入春秋、戰國時代，史稱東周。¹

自平王東遷後，原維繫西周政權的綱紀，如宗法制度、世族世官制度等趨於瓦解，神權政治發生動搖，各地諸侯稱雄爭霸，促使平民意識萌芽，提倡天人分際各有司職。²又井田制度的破壞，使稅法改變，生產力及生產關係急遽變化，加

* 本文撰作期間，渥蒙臺北藏家八玉苑不吝提供相關藏玉以供研究，謹此虔申謝忱。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¹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1953年，9月二版)，上冊，頁24-31。

² 如荀子論學貴於「有辨合，有符驗」，故曰「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徵於人，故言性惡；節於今，故法後王。其辨天人職分，治亂由人，以至於參天制天之理，甚得近代所推重。參閱黃建淳，〈試釋荀子天道觀與人道說—兼論所以化成參天制天之理〉，刊《黎明學報》，第6卷，第1期(臺北：黎明技術學院，1989年10月)，頁176-188。

劇了社會動盪不安。³對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而言，固然是結構上的禮崩樂壞，但其結果卻導致諸子蠡起、百家爭鳴的社會變革和文化上的激盪。凡儒、道、法、墨、名、陰陽各家，皆提倡各自的政治主張，法墨理論對尊天命、信鬼神、敬禮教、尚孝道等貴族的知禮友教，多採質問批判，表現知天論人、反傳統宿命及弘揚法治的基礎觀念；孔孟提倡仁人、克己、慎獨、任賢；老莊主張道法自然、禍福相倚等道德理想的建立，⁴使承襲古來的用玉傳統與發展，產生莫大的衝擊和影響。易言之，在這百家思潮大震盪的時代裡，由於天子式微、綱紀不振，促使原等級分明而森嚴的用玉制度，隨而瓦解崩潰。相對的，各地諸侯擁權自重，代表極權的逾制思想高漲盛行，⁵僭越君權之禮幾為常態。爰是之故，春秋、戰國時代的玉器質量，非但不因兵燹頻繁而減少，反而刺激了貴族用玉放肆，更因競相角逐而快速的生產和成長。

特別是在玉文化理論的建構上，孔子「貴玉賤珉」的思想，賦予「君子比德於玉」的價值，⁶使佩玉用玉的理念，愈趨於儒者道德化的傾向，亦即在人格化的玉德基礎下，擺脫了原始宗教之神格化的束縛，摒棄了鬼神天命的桎梏，從而使玉器原為神奉承的特質，演變成為人服務的本質。

類此劃時代的變革，雖非來自旦夕一蹴可幾，但在中國玉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卻因而積澱了深厚的儒家思想與理論，終而化成中華文化的重要脈絡，對後世的影響深遠，值得立論。

二、動盪世代下的僭禮用玉

春秋、戰國的亂世下，僭禮逾制習以為常，諸侯國的霸主及其卿士貴族，在汲汲營營瓜分王室權力的同時，往往需要大量的青銅禮器和華美的高貴玉器，用以彰顯尊崇的身份地位與顯赫的政治權力。又列國紛爭、群雄爭霸，窮兵黷武、以強暴弱，兼併土地、擄掠財貨，莫不強化勢力割據的獨霸地位，但此同時，霸

³ 同註 1，頁 56-57。

⁴ 同註 1，頁 75-78。

⁵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年 11 月再版），第十二章：春秋後期各國階級的升降。

⁶ 《禮記·聘義》，刊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年 10 月再版），總頁 1337。

主國內部卿大夫亦擾權奪利、糾紛不斷，甚至因而政權內鬩，引發兵戎相殺，⁷一如太史公所喻，在春秋史上「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計其數」。⁸

軍勢強大的諸侯，如秦、齊、楚、晉、宋等大國，在戰亂中雖社會生產力遭致一定的破壞，但為富國強兵多勵精圖治。春秋中葉，貴族擴展「采邑」規模，即解放山林藪澤之禁地，大興土木建城築邑，⁹城鄉大幅建設，帶動人口繁聚、促進商業興盛，至戰國時代，如史載：「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¹⁰以此足見，斯時城邑發展之迅速。另以齊都為例，「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¹¹可見當時商業都市興起及民生驟盛之概。在大都邑裡的富商巨賈，「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不乏其人。」¹²犖犖大者如春秋范蠡經商於陶邑躍為巨富、戰國呂不韋賈於邯鄲，如其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贏百倍」，¹³甚至孔子門生子貢也以「貨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致千金」，更為後世艷傳不絕的故事。¹⁴蓋商人絡繹於各國窮鄉僻壤以至通都大邑，攬買轉賣各地奇珍異寶，以供列王室、官僚、貴族等享用，¹⁵故春秋、戰國時代的商業活動，自與王公貴族奢華的生活息息相關。

⁷ 例如魯國政權旁落於季、孟、叔三大家，而各家家臣亦多專權奪利或據邑作亂，甚至季氏家臣因故，竟把魯昭公趕出國門；又如季氏家臣陽虎專橫，曾拘囚家主、威劫國君、偷盜國寶珠玉、據邑叛變。此見當時家臣跋扈、冠履倒置，王室大亂、天子蒙塵之一斑。參閱童書業，《春秋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9月台一版），頁242-243。

⁸ 《史記·太史公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5月），總頁3297。

⁹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61；翦伯贊，《中國史綱》（上海：生活書店，1946年5月），卷一，頁365。

¹⁰ 《戰國策·趙策三》，刊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9月），下冊，卷二十，總頁678。

¹¹ 《戰國策·齊策一》，劉向集錄，《戰國策》，上冊，卷八，總頁337。

¹² 童書業，《春秋史》，頁236。

¹³ 《戰國策·秦策五》，劉向集錄，《戰國策》，上冊，卷七，總頁275。

¹⁴ 同註12。

¹⁵ 近年來，數以千計東周玉器的考古發掘，大都是列國都邑和重要城址的公侯卿士等貴族墓葬裡出土的文物。參閱賈峨，〈春秋戰國時代玉器綜探〉，刊《中國玉器全集》，3，春秋戰國，（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頁1。

貴族崇玉的風尚，在東周時期已甚囂塵上，¹⁶然而在禮樂制度全面崩解的大勢下，用玉文化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根據史載不難發現，上自周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各等貴族，在用玉方面多見非禮逾節之舉。如《左傳·莊·十八》所載：虢公和晉侯覲見周王，周王設酒宴享，並對虢公及晉侯同賜玉五雙、馬三匹。即被史官批評為「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¹⁷如所週知，按周代禮制，凡祭祀、朝覲、聘享、會盟等重要典儀活動中，君臣等級分明、用玉森嚴以維綱紀，周王公侯身份不分、視為同等，足可窺見斯時制度潰散之一斑。另見《左傳·定·五》云：（魯國三大家之一）季平子卒，家臣陽虎欲以魯國君佩戴的美玉璊璠入殮隨葬，遭仲梁懷反對斥曰：「改步改玉」。¹⁸意即按禮行制，魯定公已即位，季平子應改行為臣身份，既然等級非君，自不能行用國君之玉。陽虎專橫所欲，僭禮逾制不言可喻。此外，以寶玉作為王公貴族間的賄賂，從而進行政治目的的交易，史籍所載，斑斑可考。《戰國策·楚策二》云：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但「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¹⁹此見欲藉金玉寶器及土地之賄賂，作為政治上釋放張儀的對應條件。又《戰國策·燕策二》載：蘇代為燕說齊，但見不到齊王，於是「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²⁰蘇代獻以貴重的白璧及黃金，賄賂淳于髡，作為引見齊王的對價報償。以此見之，東周王綱頹廢，寶玉已成為非禮的財富象徵。

大體而言，春秋、戰國史籍中，充滿了許多逾制非禮的記載。蓋禮制者，非名不著，非器不形，然在禮崩樂壞的世代下，名存實亡恬不為怪，一如司馬光評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綱紀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云：「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

¹⁶ 姑不論春秋五霸或戰國七雄等大國，即使小小的中山國和曾國，在其轄地範圍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除了得見當時琢玉業輝煌的成就外，亦不難想見貴族生活高度崇玉愛玉的情懷。同上註，頁 1-2。

¹⁷ 李宗侗註譯，葉慶柄校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4 月校訂版），上冊，卷四，總頁 164。

¹⁸ 同上註，下冊，卷二十八，總頁 1345。

¹⁹ 《戰國策·楚策二》，劉向集錄，《戰國策》，上冊，卷十五，總頁 528。

²⁰ 《戰國策·燕策二》，劉向集錄，《戰國策》，下冊，卷三十，總頁 1092。

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²¹信哉斯言，對是時器名不倫、禮制失調之論，恰如其份。

除文獻記載外，據近年考古發掘東周貴族墓群，從其墓主所屬的墓葬規格、隨葬器物的等級等顯示，僭禮逾制幾為普遍的現象。例如位於山東沂水劉家店子，發掘兩座春秋墓和一座車馬坑，僅在一號墓坑，即出土玉器三百餘件，分布在墓主頭部者有玉玦、玉珠、玉貝，胸前排列有玉璧、玉琮、玉璜等器，左右則有玉圭、玉璇璣及大量裝飾用玉散布其間，件件精美華麗。尤其發現青銅器九鼎八簋，以及殉人竟有三十九名之多，足見墓主身分應位居極品。但經考証，此墓位處春秋莒國之封地密邑，後為魯國併吞，墓主當是密邑封君，按理僅相當於大夫職等而已，但其墓葬規格即僭用了國君之禮，毋庸置疑。²²此外，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該墓規制宏偉，隨葬器物品類豐富，共出土禮器、樂器、漆木用具、玉器、金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等一萬五千餘件，世人矚目、中外知名。其中玉器繁多而精緻異常，有玉璧、玉瑗、玉環、玉梳、玉珮、玉帶鉤、玉雕動物等，尤以透雕多節玉璣珮飾、金縷玉璜、透雕玉璜等皆屬玉中珍品，極為高貴華美。察曾本為小國，後併於楚，在史籍上的相關記載，幾如鳳毛麟角難以索驥，然而所見曾國，卻以小國之君，享用周天子九鼎八簋之禮，加諸隨葬器類品級之豐碩精緻，不難理解此乃小侯逾越禮制，僭用了天子大禮的一宗例證。²³再者，河北省平山縣發掘出戰國時期中山國都城古靈壽城的墓葬，出土各種器類文物極為豐富，計有一萬九千餘件。其中一號墓主即中山王，陪葬玉器有玉璧、玉瑗、玉黼、玉帶鉤等，僅槨中貯藏玉器即三百五十多件，玉質上乘，精雕細琢，部分玉器上尚見墨書文字，珍貴非凡。²⁴雖然如此，但其墓葬規模浩大，亦是諸侯逾制越禮的實例。

綜上史乘與考古的省察可知，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王綱頹敗之際，各諸侯國競逐發展、稱雄爭霸，儼然成為各地域性的經濟中心，商人貨殖迅猛成長，

²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5月），頁2-5。

²²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縣文物管理站，〈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期，頁1-10。

²³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7期，頁1-13；湖北省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期，頁16-36。

²⁴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1期，頁1-31。

天下市場蔚然成形，玉器琢作與開發，已從傳統禮制的束縛得以解脫，原「以玉事神」、「以玉載禮」的功能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玉比富」的華貴玉器。因能滿足貴族對寶玉珍玩的鍾愛，是以王公貴族間，凡非禮之賄賂、餽贈，或逾制之典儀、葬禮，無不以珍玉作為財富地位的重要表徵，良有以也。

三、貴玉賤珉的玉德學說

東周世代，百家爭鳴，講學論道、著書立說，各抒其長，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成一派，學術大盛，對斯時社會的變革與文化的激盪，推波助瀾，影響至鉅。所謂諸子百家，一如《漢書·藝文志》之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²⁵依國史大師錢賓四指陳，百家的開先為儒家，儒家創始人孔子，不僅深悉現行的一切禮，更注意到禮制的沿革及其本源，據而批評當時貴族的一切非禮，並冀期用以改革世道之亂。²⁶此外，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反對禮樂奢華；道家提倡反尚智、反好動，應道法自然，無為而治；荀子知天論人，以聖王為師，主張禮治；韓非則力主法治，要驅民於耕戰，反對文學言談。²⁷大體上，諸子立論的基礎，集中表現在對傳統營巫祝信鬼神、尊禮教尚孝道的批判，同時亦反射出反對宿命、弘揚法治，以及對人生真、善、美理想境界的仰慕和企求。類此嶄新的觀念，使亘古以來傳統的玉文化理論產生了動搖，而適時孔子貴玉賤珉理念的建立，縮合了亂世中求新、求變的用玉思想，對後世玉文化的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²⁵ 《漢書·藝文志》，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再版），二，藝文志第十，總頁1745-1746。

²⁶ 儒者即術士，術士猶謂藝士，需研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65-67。

²⁷ 同上註，頁69-78。

貴玉賤珉所涉的玉德結構，主要依據玉石所固有的礦物質地加以分類，²⁸再結合人類生活中之是非、善惡、榮辱、美醜等社會觀念，賦予人格化的分析解釋，作為評價或判斷人們生活行為的準繩。其代表性的論述，揆諸《禮記·聘義》中「子貢問孔子」一節：²⁹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

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而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依據玉石顯現的物理屬性，藉物象形而精巧的賦予仁、義、禮、知、信、樂、忠、天、地、德、道等十一種倫理道德的蘊涵，如下表列以見一斑：³⁰

²⁸ 依目前考古資料顯示，早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出土的玉器，經檢測鑑定，大多為礦物學中透閃石玉材。透閃石係一種含水和氟的鈣鎂硅酸鹽，硬度為摩氏 6-6.5 度。因其單晶多作纖維狀細密交錯的聚合，故其質地呈現出溫潤細膩的半透明體，尤以新疆和闐玉的質地最佳，常見的色澤如白、青、黃、碧、墨等，是世上公認最上乘的透閃石玉料。參閱常素霞，〈中國玉器之美〉，刊于明主編，《如玉人生：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289。

²⁹ 《禮記·聘義》，孫希旦，《禮記集解》，卷六十一，總頁 1337。

³⁰ 表中「玉石物理屬性的考察」，大致參考鄭玄注釋孔子文義而言。同上註，總頁 1337-1338。

表一：玉德對應於玉石屬性考察略表

序/玉德	玉德的蘊涵	玉石屬性的考察
1. 仁	溫潤而澤，仁也。	質地溫潤，光澤柔和，象徵仁心和諧與博愛。
2. 知	縝密以栗，知也。	質料結構縝密不紊，紋理序列嚴謹，寓如智識審慎之德。
3. 義	廉而不劌，義也。	玉料硬度之高低，相關於玉表呈現的紋脈，自外可知其內的虛實。
4. 禮	垂之如隊，禮也。	玉石密度高而質重，佩掛垂墜用以節步，顯示禮儀態度與舉止風範。
5. 樂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玉材性韌結實，叩聲沉穩舒暢，博以遠聞，如叩心絃。
6. 忠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玉質上的斑點瑕疵和美麗的光華，互不彌蓋或掩飾，顯現出忠誠不二的本質。
7. 信	孚尹旁達，信也。	玉彩色澤四溢流露，毫不隱晦，寓為內在所有，一如外表所見，即人之誠信。
8. 天	氣如白虹，天也。	玉為自然礦物，乃天之造化以成，所具氣質即如天際白虹，寓為不可逆的神聖。
9. 地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	玉石藏於地礦，與山川同聚浩然正氣，寓為精神永在與價值永恆。
10. 德	珪璋特達，德也。	珪璋向為國之重器而維綱紀，以玉石比為珪璋，具有崇高之美德。
11. 道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玉石蘊涵以上諸德，與其同德即君子之道，故君子比德於玉者，人人敬重。

當孔子解析玉石十一德後，管子也論列玉有九德：³¹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

此外，荀子亦言，玉有七德：³²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大體而言，春秋、戰國時期的玉德學說，多根據玉石的質地、光澤、紋理、硬度、音色等自然的物理屬性，賦予儒家學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信念，³³從而使玉器發展成倫理政治與行為道德的價值觀，對嗣後精神文化的建設良多不言可喻。影響所及，即使其他非玉似玉的美石，如瑪瑙、煤玉、滑石、葉臘石（凍石）等珉石，因質地略具玉石相若的屬性，故也常充為美玉，雕琢成華麗的珮飾，比擬為崇高的玉德。

細察下，在東周以前的用玉思想及理論，多起源於氏族社會結構和原始巫術的宗教觀念，係建立在神權政治之祭祝與征戰的基礎上。春秋伊始，孔子藉貴玉賤珉的解析，終結成君子比德於玉的理念，把數千年來服務於巫術宗教和神權禮儀的玉器，轉變成政治倫理與行為道德的器用，類此用玉思想的確立，標誌著玉器人格化的形成，引發了玉器創作與生產向度的根本變化，為傳統玉器之步上新文化，奠下了基本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四、東周玉器賞析

春秋、戰國玉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儒派玉德學說的介入，從而王室貴族莫不重玉，諸侯封國以玉，朝聘、會盟以玉，祭祖事神以玉，冠弁服飾以玉，殤

³¹ 《管子·水地》，刊李勉，《管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9月二版），第三十九篇，頁676。

³² 《荀子·法行》，刊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初版），第二十卷，頁597-598。

³³ 《論語·為政》，刊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6月二版），卷二，頁16。

逝歛葬以玉，爭奇鬥艷，蔚為風尚，凡貴族階層幾皆佩戴寶玉，以顯身份地位，以彰君子之德，故《禮記·玉藻》所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³⁴自此以後，玉文化注入新的內涵，在創作思維、藝術設計、技術加工等方面，都出現了嶄新的特色，綻放出生動傳神並具高度美學的造詣，在我古代玉器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東周玉器依其用途可概分為禮器用玉、裝飾用玉、生活用玉及喪葬用玉等。但有若干玉器，卻同時兼具多種功能，例如原為禮器的大璧，形制愈作愈小，演變成裝飾用的珮飾，甚至也可成為斂屍玉衣用的配件，³⁵此亦見諸斯時社會變革的例證之一。大體上，禮儀用玉多見珪、璧，殷商、西周常用的玉戈、斧、鉞、琮等逐漸消褪。反倒是裝飾的佩玉成為當時的主流，尤以玉種繁多，除璧、環、璜（玕）、觶外，其他如龍、鳳、虎、獸、珠、管、人等形飾組合多變，紋飾繁縟而精細，建構成春秋、戰國時代玉器的重要特色。礙於篇幅侷限，自不能盡賞每件玉器，謹據相關的考古資料及部份公私立藏玉，舉隅如後。

例一：玉璧

殷商、西周的玉璧多光素無紋，春秋、戰國時代的玉璧則大放異彩，多飾有圖案化的穀紋、雲紋或龍紋、鳳紋、獸紋等，如山西省太原市金勝村趙卿墓，出土一件穀紋及雲紋相雜的玉環，穀粒飽滿，紋飾精巧有序，內外緣凸起，格外秀麗。（圖一）



圖一 春秋 穀雲紋玉環

璧徑 8.0 孔徑 4.2 厚 0.6 公分

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摘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 169。

³⁴ 《禮記·玉藻》，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三十，總頁 749、752。

³⁵ 如南越王趙昧的玉衣，將形制小璧綴繫於頭套的頂部。參閱林業強，《南越王墓玉器》（香港：兩木出版社，1991年12月），圖 9。

另見臺北藏家八玉苑提供一件戰國玉環，玉色青白，因受沁呈局部褐斑，(圖二)也因未能平整切割，徒使璧面留下歪斜不整的原始切面。(圖二之1)器表以陰線及淺浮雕琢作雲紋，並有機地組成十二條排列規整的吐舌龍，(圖二之2)佈局工整有序，係戰國常見的風格。



圖二 戰國 龍紋玉環

璧徑 12.9 孔徑 6.5 厚 0.7 公分

摘自黃建淳，《中國玉器文化特展圖典》
(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6月)，圖055，頁142-143。



圖二之1
未能平整切割，徒留歪斜的原始切面。



圖二之2
線刻及淺浮雕琢出生動的吐舌龍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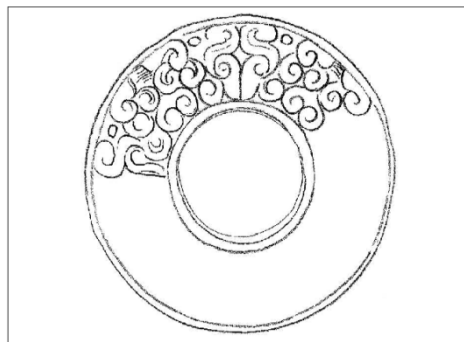
璧的用途，大抵用於貴族間的祭祀、朝覲、聘享等典儀場所或饋贈之用，但也盛行於殤逝隨葬以顯身份，由於裝飾的功能愈考究，其雕琢的紋飾也愈精美，而形制亦趨小巧，往往成為貴族服飾不可或缺的繫璧。³⁶如八玉苑另藏一件璧徑僅4.2公分的繫璧，泛青綠色，質地縝密，光澤內蘊，局部沁有褐斑，溫潤可愛。小小

³⁶ 賈峨，〈關於春秋戰國時代玉器三個問題的探討〉，刊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第二冊，頁71。

的璧面，竟可填裝四對共八條面對面的吐舌龍，每一條龍概由七朵卷雲紋排列組成，不但繁縟精巧，且華麗討喜，亦突顯了貴族生活的嬌奢。(圖三)相類的龍紋繫璧，亦見大陸藏家傅忠謨的收藏。³⁷



圖三 戰國 龍紋繫璧
璧徑 4.2 孔徑 1.5 厚 0.5 公分
臺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圖三之 1 戰國龍紋繫璧線繪圖

除了繫璧外，更發展出在璧左右的邊緣外，附雕對稱的雙虎、雙龍或雙鳳，即俗稱的「出廓璧」，如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一號墓出土的雙鳳穀紋璧，璧面淺浮雕疏朗的穀紋，左右出廓透雕背向而立的雙鳳，鳳身陰刻竹節紋，體裁彎曲、鳳冠修長，尾翎寬闊，顯得分外敏健。(圖四)



圖四 戰國中期 雙鳳穀紋璧
長 7.6 璧徑 4.0 公分，孔徑與厚度不詳
摘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
河北，頁 179。

³⁷ 傅忠謨著，傅熹年整理，《古玉精英》(臺北：中華書局，1990年4月)，圖44，頁113。

另見八玉苑所藏一相類的玉件，璧面相同排列有序的穀紋，左右亦透雕出廓而對稱的鳳鳥，惟鳳鳥姿態大不相同，所見鳳首昂視鼓胸，張喙嘶鳴若振翅欲飛，長尾搖曳生姿，體態呈柔和的 S 曲線，造型更顯生動而優美，婉如一雙朝氣蓬勃的鳳凰。(圖五) 貴族佩戴，足可彰顯其不凡的身份及優雅高貴。相類的玉件，亦見臺北藏家養德堂的收藏。³⁸



圖五 戰國晚期 雙鳳穀紋玉璧
通長 8.8 璧徑 5.5 孔徑 2.0 厚
0.4 公分
摘自黃建淳，《中華玉器文化特展
圖典》，圖 070，頁 172-173。



圖五之 1 生動優美的出廓玉鳳



圖五之 2 出廓玉鳳線繪圖

³⁸ 鄧淑蘋，《群玉別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年 10 月)，圖 70，頁 194。

airiti

例二：玉璜（珩）

玉璜原係一半璧或半環、半環形的珩飾，在新石器時代文化，即曾見與瑪瑙、綠松石等管、珠相串連，作為佩戴裝飾之用。³⁹又據郭沫若的研究：「黃（按：璜）、珩、衡為一物」；⁴⁰清代古玉名家吳大澂亦考証：「珩、衡二字古通，衡即古橫字，大篆作黃。今以所得白珩証之，其制平如衡木，而兩端下垂皆有孔可繫雙璜。璜之兩端亦有孔，可繫琺瑯、衡牙、蠙珠之類。」⁴¹故可知璜即珩，兩者一也。至西周的玉璜，則以橫繫和縱繫兩種形式綴於玉組珩間，⁴²美侖美奐，十分華麗。到春秋、戰國時代，貴族身佩玉璜，更加盛行，常見構圖巧思、雕作精良，盡顯身份地位。如所見出土於安徽省長豐縣楊公二號墓的蒲紋雙鳳玉璜。（圖六）玉色青白，有黃褐色斑，片狀呈扇形，兩側邊緣飾微凹扉棱。璜面滿佈蒲紋，最特別的是，頂部出廓琢作對稱的回首鳳鳥，其鳳尾張揚，部份伸卷的翎尾，以陰線刻劃於廓內的蒲紋中，若隱若顯地顯要出高雅出眾的形態。



圖六 戰國 雙鳳蒲紋玉璜

長 13.3 寬 3.70 厚 0.35 公分

現藏於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6，
安徽，頁 81。

臺北藏家八玉苑珍藏一件更勝一籌的雙鳳雙龍大璜，全長 26.50、寬 7.46 公分，足為上件（圖六）兩倍有奇。玉色青綠，質地細膩，體扁如半璧，呈扇狀，局部

³⁹ 方國錦，〈西周玉器簡說〉，刊陳志達、方國錦主編，《中國玉器全集》，2，商、西周（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頁27。

⁴⁰ 郭沫若，〈釋黃〉，刊《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第二卷，頁163。

⁴¹ 吳大澂，《古玉圖考》，收於鄧淑蘋，《古玉圖考導讀》（臺北：藝術圖書公司發行，1992年9月），頁130。

⁴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圖29，頁20。

附著硃砂、黏有土垢等。璜的兩端鏤雕雙龍首，齒孔即可用於穿綴，另繫他件玉飾；雙龍共身成為璜面，其間佈滿穀紋，粒粒厚實飽滿。玉璜上端出廓透雕兩隻回首雙鳳，鳳身修長婆娑，羽翼卷曲曼妙，尾翎輕盈如風飄逸。(圖七)尤以左右鳳冠相連，其中鏤空穿繫懸吊，果如吳大澂所証「其制平如衡木」，令人讚歎。據不完全的資料顯示，東周出廓玉璜之器大雄偉，尚未見有出其右者。⁴³佩戴如此大璜，除盡顯其地位之高外，亦可同比為財富之鉅，故按理不難推測，大璜的擁有者非君即侯，雖不中亦不遠矣。



圖七 戰國 雙鳳雙龍穀紋玉璜
長 26.50 寬 7.46 厚 0.50 公分
臺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此外，另見一構圖新穎的雙龍玉璜。(圖八)器雖不大，但琢作精巧。青白玉質，紅褐色沁斑遍佈了相當的面積，且因浸蝕較重，器表不難發現諸多大小蛀孔。璜

⁴³ 如所見安徽省長豐縣楊公二號墓出土，現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戰國勾連穀紋玉璜，器長 17.4、寬 2.7、厚 0.32 公分。刊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0 月)，第六冊，頁 89。又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的一件戰國穀紋玉璜，長 25.9、寬 5.5、厚不詳。刊周南泉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 4 月)，(上)，圖 134，頁 162。

之兩端對稱的龍頭，鏤雕張嘴露齒如仰頸吐氣，線條流暢，生動傳神。璜面即雙龍的共身，中間隱起分為左右兩區，飾滿井然有序的勾連穀紋；器下出廓，以金屬線鋸鏤雕出回旋瑩繞的祥雲。整體氣象，一如雙龍遨遊於天上的彩雲間，恰得以領會，龍被尊為興雲致雨之神祇的信仰，用以祈雨，冀期豐收，寓為國富兵強的裝飾用玉。身佩此璜，既彰身份亦顯富貴，當為貴族莫不愛戴的寶玉之一。類此器下出廓的雙龍玉璜，幾皆細琢精雕，件件精彩，如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即有三件。⁴⁴



圖八 戰國 勾連穀紋的雙龍玉璜
長 11.50 寬 3.20 厚 0.57 公分
摘自黃建淳，《中華玉器文化特展圖典》，
圖 066，頁 164-165。



圖八之 1
受礦物腐蝕，生成諸多蛀孔的器表。

例三：玉組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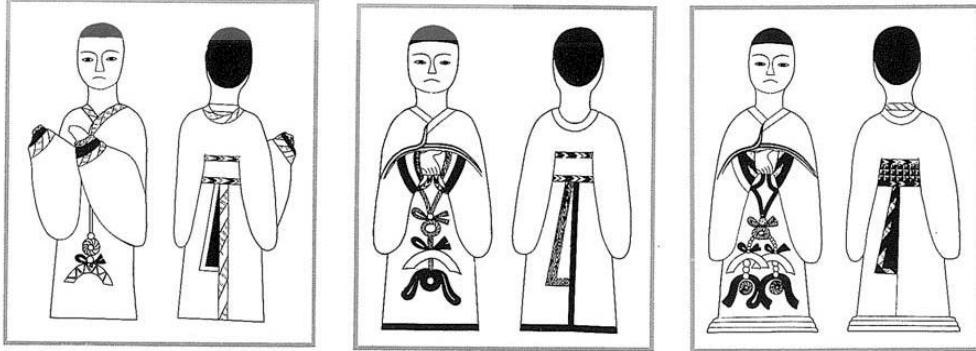
顧名思義，組珮當非單一的玉珮，而是由許多形制各異的裝飾用玉組合而成，常見成對的串飾，佩戴於墓主人的胸前。從近年來考古發掘多處東周的墓葬可知，社會地位越高的貴族，其所佩戴的組件愈多，串飾愈長，琢作精良，華貴非凡。⁴⁵

（附圖一及二）

⁴⁴ 參閱周南泉，《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上），圖 138、139 均為「出廓式璜」，圖 140 為「鏤雕雙龍首璜」，頁 166-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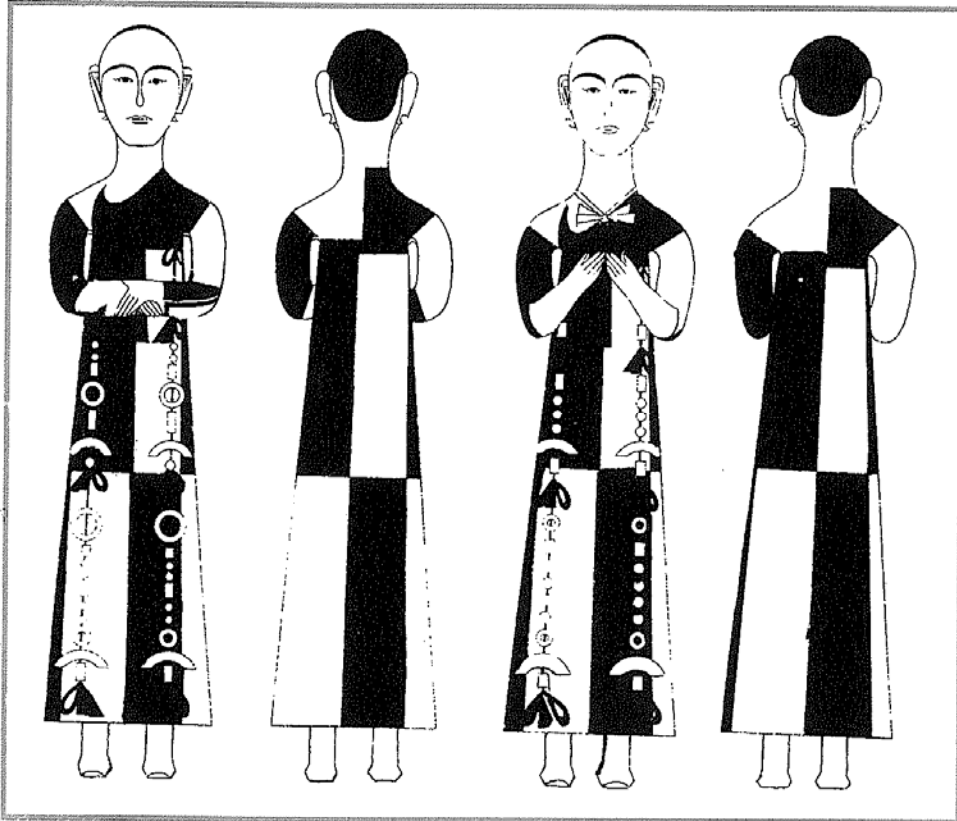
⁴⁵ 如河南上村 1820 號墓棺內和棺蓋器物，發現有頸部及腹部的串飾；山東曲阜魯國故城 58 號墓出土一組 13 件的玉組珮，洛陽中州路 1316 號、2717 號墓亦出土置於人架胸前的玉組珮等。參閱賈峨，〈春秋戰國時玉器綜探〉，刊《中國玉器全集》，3，春秋戰國，頁 26。

附圖一 河南信陽楚墓二出土的彩繪漆木女俑



資料來源：賈峨主編，《中國玉器全集》，3，春秋戰國，插圖 24、25、26，頁 39-40。

附圖二：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出土的彩繪漆木俑



資料來源：賈峨主編，《中國玉器全集》，3，春秋戰國，插圖 27，頁 40。

藏家八玉苑提供一組七件的組珮，均為青白玉，質地上乘，光澤溫潤，惟多

處受礦物浸染，局部呈牙白色斑，且器表多附著土垢，黏有硃砂等。(圖九)從各件紋飾風格研判，七件應屬同一組珮，由於原組合方式不詳，暫模擬排列如圖示。(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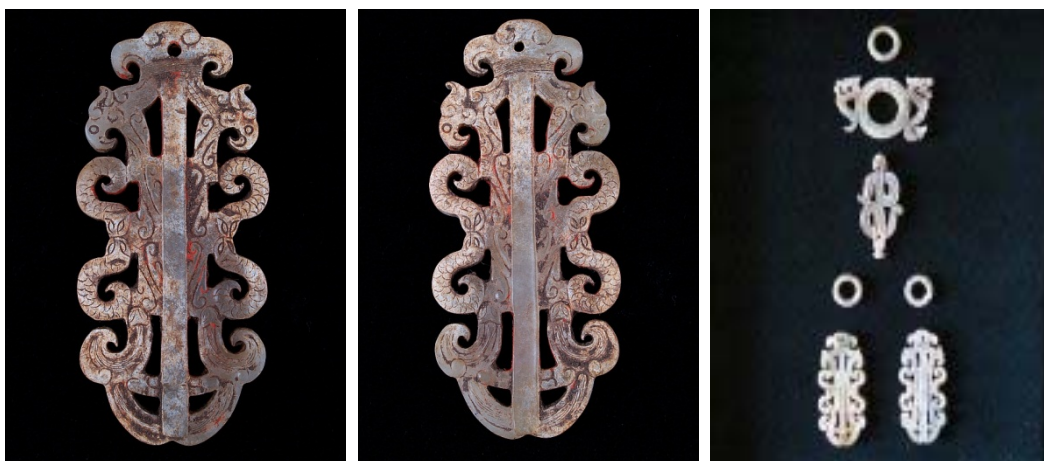
圖九 戰國玉組珮 臺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組珮 1、4、5 構件絢索玉環

組珮 2 出廓龍形玉環

組珮 3 迴旋雙龍玉珮



組珮 6 龍鳳玉珮 (甲)

組珮 7 龍鳳玉珮 (乙)

附圖三 玉組珮模擬圖

組珮 1、4、5 構件絢索玉環：外徑 2.1-1.8，孔徑 1.3-1.1 公分

組珮 2 出廓龍形玉環：長 6.5，寬 3.8，環徑 3.6，孔徑 2.1 公分

組珮 3 迴旋雙龍玉珮：長 6.2，寬 3.0，厚 0.45 公分

組珮 6 龍鳳玉珮 (甲)：長 3.2，高 6.8，厚 0.46 公分

組珮 7 龍鳳玉珮 (乙)：長 3.1，高 6.8，厚 0.47 公分

依附圖三模擬圖示，組珮 1、4、5，皆琢作絢索形環狀，應為掛飾構件之用。組珮 2 以龍為母題，透雕為出廓龍形玉環，環中線刻虺龍，其首尾隨環形相銜，龍

身刻劃細緻有序的鱗紋，環外兩側各立一相背的出廓龍，龍眼凝視傳神，龍軀中脊隱起，填滿陰線，格外矯健；雙龍雖盤踞左右，但型態並不對稱，看似刻意的構圖，其義待考。組珮 3 亦以鏤雕的雙龍為題，龍身分向左與右方迴旋，而後自身盤卷，形成相對稱的雙龍珮；龍首上以砣具碾出的一雙菱形眼，目光如炬，如蟒似蛇，造型別緻。組珮 6 和 7，構圖巧思，以聳立雲端的砥柱，鏤雕出左右對稱的龍鳳珮。如所見雙鳳雲遊天際伸頸俯視，下方雕琢兩對龍口相銜的虺龍，滿飾鱗紋的身軀蜿蜒，其下又見兩條小龍依偎附勢，佈局生動可愛，紋飾碾琢考究。類此戰國早、中期鏤雕精巧的玉組珮，湖北省曾侯乙墓、河南省平山縣中山國三號墓等皆有出土，⁴⁶臺北藏家藍田山房、⁴⁷暫集軒等亦不乏收藏。⁴⁸

總之，這些佩戴在貴族身上的組珮，不僅僅是光彩奪目、高級華貴的表徵而已，特別是在祭祀、朝覲、聘問等國家典儀的活動中，藉以節步發聲以顯舉止優雅，展現出渠等和寶玉一樣，具有崇高的品德，當被尊稱為時尚的「君子」，一如「君子比德於玉焉」的高貴貞潔。

例四：玉虎

春秋、戰國時期，盛行各類動物造型的玉珮，常見者有龍、虎、羊、馬、兔、龜、蟬、蛙等等不勝枚舉。其形制多屬於扁平片狀，俾便於佩戴的用途。但本例的動物，並非片狀綴繫之用，係一圓雕可立的動物，其功能應屬擺件以供祭禮或陳設之用。自春秋晚期冶鐵技術問世後，鐵器廣泛地應用，推動砣具的改革，促進了琢玉技能的長足進步。⁴⁹斯時圓雕動物的工藝，正是「利其器，善其事」的絕佳表現之一。

山東省曲阜市魯國故城乙組三號墓出土的玉馬、⁵⁰山西省長治市分水嶺八四號墓出土的兩件玉虎，⁵¹皆是立體圓雕精作，應屬貴族生活中陳設觀賞的藝術品。以玉馬為例，(圖一〇)玉質青色，雜有斑紋，其立姿昂首，豎耳前視，如聚神聆

⁴⁶ 賈峨主編，《中國玉器全集》，3，春秋戰國，圖 159、180、221。

⁴⁷ 鄧淑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臺北：財團法人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 年 10 月)，圖 62，頁 201-207。

⁴⁸ 鄧淑蘋，《群玉別藏》，圖 52，頁 156-157。

⁴⁹ 趙永魁，〈歷代制玉工藝演進和分析〉，刊于明主編，《如玉人生：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華誕文集》，頁 273-274。

⁵⁰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第四冊，頁 211。

⁵¹ 同註 46，圖 149、150。

聽和觀察；頸後鬃毛如戟，馬尾卷曲挽髻，尤以腿肌清晰，益顯雄健粗壯，而馬蹄分明，似如奮揚沙場。其形象生動逼真，將駿馬寓靜於動的神韻表露無遺，曾被譽為戰國時期玉馬的代表作。⁵²



圖一〇 戰國 玉馬

長 4.5 高 5.7 寬 1.8 公分

現藏山東曲阜文物管理委員會

摘自古方主編，《中國古玉器圖典》，頁 197。

此外，八玉苑亦提供一罕見的圓雕玉虎。(圖一一) 玉色青綠，瑩澤溫潤，惟多處受沁白化，器表也附著硃砂土垢。形制略呈條形錐狀，見其頭頸前伸，尖耳後張，巨目凝神及利齒伶牙，一如虎視眈眈於蓄勢待發。虎身飾滿卷雲紋像虎斑，其長軀貼地，屈肢伏行及奮揚鼓尾，一副摒息欲撲之勢，神態兇猛、威武逼人。細察本器雕琢，特別著意於目光如炬、口齒鋒利的刻劃，尤以鐵具琢作深浮雕的卷雲紋，效果突出飽滿，而所有線刻，婉轉流暢又遒勁利落，⁵³使頭、身、腿、尾等部位起伏自然、層次清楚，充份表現了猛獸的特性與本能，造型挺拔生動，猶如虎骨之風，更揚張力之美。貴族宮室生活中，陳設類此威武錚錚的猛虎，正足以彰顯主人身份地位的威儀雄風。

⁵² 古方主編，《中國古玉器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3月)，頁197。

⁵³ 筆者的觀察心得以為，商周玉器的線條，多表現柔和纏綿，缺乏剛力；而春秋戰國玉的線刻，不但剛勁簡練，且灑脫流利，此乃廣泛運用鐵器砣具之故。



圖一一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卷雲紋玉虎

長 8.65 寬 1.86 高 2.3 公分

摘自黃建淳，《中華玉器文化特展圖典》，圖 053，頁 138-139。



圖一一之 1 卷雲紋玉虎上視圖



圖一一之 2 卷雲紋玉虎頭部

例五：玉羊

在六畜中，羊係最早被馴養的家畜之一。據考古發掘，河南省安陽市婦好墓出土的羊首玉珮，⁵⁴以及山西曲沃縣晉侯墓出土的玉羊，⁵⁵（圖一二）不難想見殷商、西周時飼羊規模已相當可觀。

⁵⁴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第五冊，頁 37。

⁵⁵ 同上，第三冊，頁 123。



圖一二 西周玉羊

長 5.0 寬不詳 高 2.5 公分

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摘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山西，頁 123。

西周以後，羊逐漸成為吉祥的象徵，因古字「羊」與「祥」通，如漢代銅洗中的銘文「大吉祥」，就寫為「大吉羊」，⁵⁶即見「羊」之「祥」義。又「羊」與「陽」諧音，「陽」指陽氣，為春天之象，如冬去春來，陰消陽長，有吉祥之氣，而春有三月，故稱「三陽」，易經「正月為泰卦，三陽生于下」，故曰「三陽（羊）開泰」，⁵⁷常作為歲首稱頌的祝語。

八玉苑所藏玉羊，圓雕呈站立狀，全器幾皆白化，碳末土垢附著不少。引人注目者，莫過於羊首神情的雕琢，所見頭上兩側外展下彎而內卷的大角，角上稜脊深刻，立耳後伸旁聽，杏眼前視凝望，鼻翼翕張、唇嘴緊閉狀若沉思，神態淳樸極具親和力。而其胸挺略鼓，腿肌分明，蹄趾結實，加諸臀腹渾厚，體態益臻豐滿而穩重。最特別的是，在羊背上刻滿深浮雕的雲紋變形龍，腹側雕琢一結構清晰的龍面；而在前、後腿上，線刻遍佈鱗紋而迴旋的龍身，一如當時盛行的合首雙身龍紋。⁵⁸本器紋飾繁縟、碾琢考究，可能在貴族宮室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用途。姑不論為何，就整體形象言，泰然自在，曲線優雅，盡顯吉羊恭良溫順與憨厚篤實的性格，尤其眾所週知羔羊跪乳、仰以秉禮的習性，更成為自詡謙謙君子而競相倣效的美德。（圖一三）

⁵⁶ 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臺北：南天書局，1990年2月），頁438。

⁵⁷ 殷志強，〈玉羊玉吉祥〉，刊《文物天地》（北京：文物天地雜誌社），2003年2期，頁37。

⁵⁸ 戰國盛行的合首雙身龍紋，常琢作為玉璧上的紋飾。如在山東省曲阜市魯國故城52號墓，即出土兩面分別為璧徑31公分的三層璧，及19.8公分的雙層璧，其外層皆琢刻合首雙身龍紋。見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第四冊，頁205-206；又河南省許昌市張潘鄉，亦出土一面雕飾合首雙身龍紋的戰國玉璧。同上，第五冊，頁210。



圖一三 戰國 卷雲紋玉羊

長 11.50 寬 4.35 高 9.35 公分

臺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圖一三之 1 羊背上深浮雕雲紋變形龍



圖一三之 2 腹上雕琢的龍首

五、結論

孔子上承周公制禮的初衷，藉以玉比德的學說，冀期喚起貴族講信修睦，克己復禮而免僭制非禮，俾能助於貴族間關係的調節，從而減少國際衝突，益臻社會和諧。這或為春秋、戰國時代，佩玉之風之所以甚囂塵上的要素之一，故每一符合君子身份者莫不戴玉，一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原理。

固然在佩玉的君子中，不乏明德慎罰、勵精圖治的開明君主，但亦發現，對於若干貴族而言，咸以「玉不去身」的手段，既可表彰為「以玉比德」的君子，又可炫耀成「以玉比富」的高貴，或因此而使佩玉精美良多的貴族，卻沉淪為乏德可陳的偽君子。無論如何，「以玉比德」和「以玉比富」，看似相左而對立的觀點，但卻能兼容並蓄地融合在斯時的亂世裡。以另一角度而言，歷來社稷更替、文化變革以至改朝換代，此乃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春秋、戰國時代的動盪，正

是沿其發展的規律向前邁進。是以玉人細琢精雕的玉器，不論質純、形雅、工精、意深等蘊藏的文化遺產，迄今依然綻放出璀璨不朽的光輝。

儒家的玉德學說，為玉器注入了崇高的品德及其典雅的藝術，大師錢賓四研究中國人的文化結構認為，「中國文化一是道德的，一是藝術的。道德與藝術，都是人生內部自發的，而這兩個亦是內在相通的。我可以先講一個結論，最高的道德，就是最高的藝術；最高的藝術，亦即是最高的道德。」⁵⁹總之，緬懷春秋、戰國時代的每件玉器，皆潛藏著悠久的歷史文化，蘊含著深厚的精神內涵。易言之，玉器之美，早已超脫了質美工巧的藝術美，它是一種比自然物象更具生動、更具魅力的人文意義，是歷經神交古人後再生的人文價值；這種價值與意義，何嘗不也是道德與藝術之交融與昇華的結果，從而博取了世人對玉器難以割捨的愛，也賡續了古來尊玉愛玉的民族情懷，既承先啟後，更歷久彌新。

⁵⁹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7月第九版），頁102。

A Study of Jade Virtue Acclaimed from Jade Culture in Eastern Zhou

Huang Jiann-chen*

Abstract

Eastern Zhou period was a tumultuous era.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de, Confucianism was concentrated on the high moral doctrine, and raised a moral and ethical philosophy under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appreciating jades. It hoped to reconstruct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wearing elegant jades was built among the nobles to show their compliance with the eth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and that had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hinese jade culture.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of jades, has researched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the jade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Keywords: Eastern Zhou period, Quiyujianmin(貴玉賤珉), Jade virtue, Jade as rich metaphor, Jade cultur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